

THE SPIRIT OF 双语图文版

中国人的精神

宋黄兴涛
小庆译

古吳軒出版社



双语图文版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 著

黄兴涛 宋小庆 译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精神：汉英对照 /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7-80733-280-0

I. 中… II. ①辜…②黄…③宋… III. 民族性—研究—中国—汉、英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6231 号

责任编辑：陈雪春

装帧设计：陆月星

插图：李 昉 黄 炜

责任校对：杨义侠

责任照排：陆 菁

书 名：中国人的精神

著 者：辜鸿铭

译 者：黄兴涛 宋小庆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hs.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630 × 960 1/16

印 张：22.5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280-0

定 价：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前言

“人文风景”辜鸿铭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黄兴涛

早在五四时期，辜鸿铭那副由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所构成的遗老形象，就已使他成为北京街头和北大校园的一大景观。人们既以围观他为乐，他也乐得以“京城一景”自嘲。

1921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隆之介来华游历时，有一位西方友人握着他的手特别提醒他：“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见辜鸿铭啊！”见过辜氏之后，这位日本作家欣然承认，其友人此言“真不我欺”。

在近代中西冲突、古今交汇的历史时代，辜鸿铭的确不愧为一道充满魅力的人文风景。其可观之处，不仅在于他有怪诞的外表、奇异的行为，机智灼人、滑稽诙谐的名士个性，也不仅在于其对人生、文明和东西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而更在于他那独特的人生经历、风格和思想倾向等诸多因素综合汇聚而成的深厚的文化蕴涵。

这位名震中外的文化人，本名汤生，以字行世，原籍福建同安，1857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少年出洋，游学欧洲十余载，通晓英、德、法、拉丁和希腊等近十门语言，曾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年近而立之时，正式回归中土。回国后，他先是在张之洞幕府做了十七年的洋文案，后又督办过黄浦浚治局，清末时曾官至外务部左丞。民国初年，他任北京大学教授。1928年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二岁。

也许,把辜鸿铭作为“审美”的客体而不是“求真”的对象来对待,则要容易和省事得多。虽然作为一种“人文景观”,不了解它真实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就好比参观故宫而不了解儒家精神、宫廷文化和建筑传统一样,将难以有深层次的欣赏。但既然“了解”永远只能相对而言,你便无法阻止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依然有彼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感受,并且这种感受也绝非只是符合“历史真实”时才算有益。

我敬仰辜氏那颗挚爱吾国吾民的火热的中国心,喜欢笼罩其一生的浓厚的人文色彩,也同情他为之冲动的那种鲜明、强烈而又执着的人文关怀。正如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所说:“他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罕见的人文主义者。”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还没有人像辜氏那样毫不含糊地宣称过:评判文明的标准只能是人,是该文明化下之男男女女本身的文化教养状态,而不是人的创造物;也没有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人像他这样极度地强调人类生存的道德价值和精神生活的绝对意义。很容易指出辜氏的偏颇,甚至要严正地批判他的人文关怀中缺乏西方人文主义的“平等”内涵;但当读到他谴责近代西方世界人与人之间已经沦落为一种可怕的金钱关系的文字时,当看到他表明喜欢用手势亲切地招呼仆人而讨厌按电铃时,当他真诚告诫日本人千万不要废弃书法教育、不要学西洋人使用打字机,以免丧失我们东方在这方面所有表现美的方法时,我心灵深处总有一种微妙的感觉被其触动。我知道,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感觉。

时下,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实践,对于人类来说其实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合理化。因为它似乎总是以毁灭一些对于我们仍有价值甚至很重要的东西作为代价。正如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经济在迅速发展,防盗门也在急剧增多;法律意识在加强,道德意识却正在削弱;世界在日益缩小,而人与人之间却日渐疏远和陌生;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对机器的可怕性依赖也越来越大。或许艾恺说得不错,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冲突,正是一种发自人

程度。因此,无论对该书内容作何评价,将它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出版,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这次修订出版的译著《中国人的精神》,是应古吴轩出版社之请,专门为这个双语图文版准备的。十二年前,我和宋小庆最先推出该书初译本的时候,为避免译文的冗蔓,曾对辜鸿铭原作中反复申说的演讲部分作过一点合并删节之类的简单处理。这回,为了更准确完整地再现原作风貌,也为满足中英文对照读者的需要,我征得小庆兄同意,又对其中有关部分的内容予以补译或重译。这是应该向读者加以说明的。

今年正好是辜鸿铭逝世八十周年。出版此书,也可藉以表达我们对于这位文化怪杰由衷的纪念之情。

2008年11月18日于北京世纪城

作为一个文化人，辜鸿铭令人关注的奇异之点颇多。约而言之，起码有如下数端：一是具备罕见的语言天才，尤其是英文造诣，已臻出神入化之境，林语堂、孙中山都推他为“中国第一”；二是毕生逆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致力于文化输出工作，且极具世界效应。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曾译《论语》、《中庸》和《大学》），享有以“哲学家”和“东方文化代表”驰名西方的特殊名望。就其著作在欧美的阅读范围之广和产生过相当程度的轰动效应而言，他实在无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林语堂一人有此殊遇。此外，他还是近代中国学者中被日本聘去讲学时间最长的一位。

即便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辜氏也有别具特色之处。他的思想既不同于晚清的一般洋务派、顽固派和国粹派，也有别于民国初的“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至于说到其逸闻轶事的流播之广、古怪名声之响亮和神秘色彩之浓厚，近代文化人中也鲜有可以同他相提并论者。

不过，辜鸿铭最让人惊奇的一点，还在于其通晓西学而又趋极端保守的内在矛盾。他自幼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曾十足地西方化，回国时连汉语也说得不好，但并不见其有明显激进的思想表现，而是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玩索并很快归服儒家传统。其态度后来还日益保守，发展到连纳妾、小脚和辫子等“国渣”陋俗也不愿放弃的顽固程度。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着实堪称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

多年前，我就是在上述种种奇异之点的吸引下，加入到了研究辜鸿铭的行列。我相信，大凡在“怪人”身上，总会凝聚更多社会的、文化的和人生的奥秘，他可以满足自身那无法遏止的求知欲。然而岁月蹉跎，至今我仍不敢言对他已有很深入的认识。每每重读辜氏著作和他人研讨辜氏之文，常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新鲜感。要捕捉辜氏真实全面的历史踪影，洞悉并揭示凝聚在他身上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真是谈何容易！

性深处的无法消除的矛盾,这虽使我们感到无奈,却也不应绝望。它提醒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必须理性地对待“反现代化”思想,自觉地设法克服或消解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否则,当“克隆”人之类的孽种纷纷出笼时,我们人类就只好眼睁睁地瞧着自己被自己的异化之物所毁灭。

当然,无论是阅读辜鸿铭的书还是阅读记述他的文字,首先给人的感觉还是轻松。你时或将忍俊不禁,扑哧一乐;时或会微微颌首,会心一笑;时或要撇撇嘴,摇摇头,付之一哂。在这一乐、一笑、一哂之间或之余,你会引发出对于文化、传统和人生问题的思考,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反思和认识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这就是我称辜鸿铭为“人文风景”的原因,也是我多年来愿意主持翻译他多种外文著作的原因。

辜鸿铭一生主要以英文写作,汉文著作仅有《张文襄幕府纪闻》和《读易草堂文集》两种。英文作品则有《尊王篇》、《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和《中国人的精神》等多种。此外,还有以德文和日文保存下来的著作,如《呐喊》和《辜鸿铭讲演集》等。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也最能集中反映他思想的著作,国内学者以前较为熟悉的书名为《春秋大义》(也曾自题《原华》)。该书1915年由“北京日报社”首版,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重版。它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比之同类著作,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早四五年。

《中国人的精神》出版后,立即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引起轰动效应,各种报刊纷纷摘录和译载,成为“臧否议论之的”。1916年,该书的德文版译本即已出版,以后还几次重版;1927年和1941年,其法译本和日译本也相继问世。五四时期,此书在西方的影响还反馈到国内,引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之间的激烈争论,促使当时思想界的東西文化论争达到白热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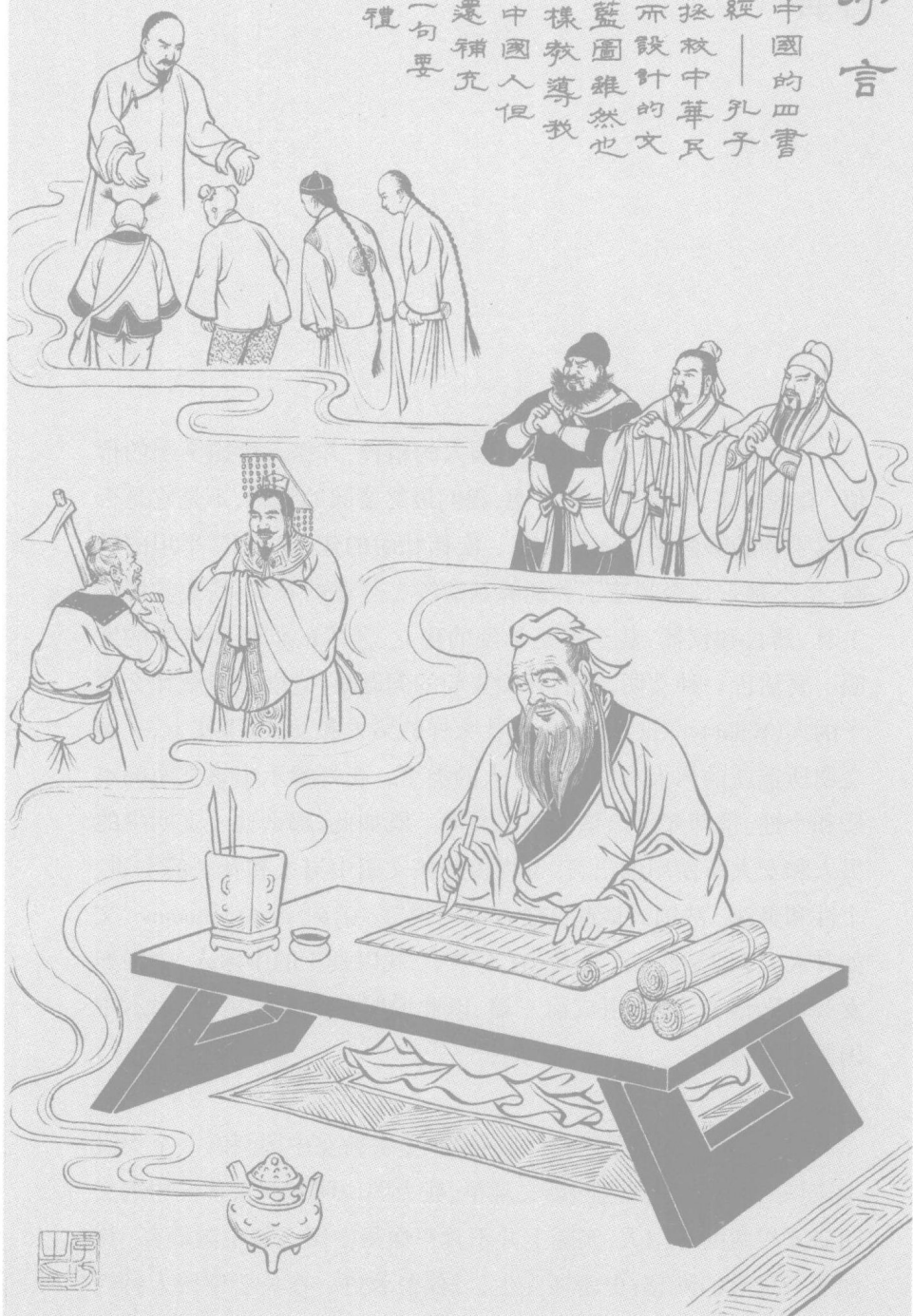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序言	002
PREFACE	168
导论:良民宗教	016
INTRODUCTION: 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	185
中国人的精神	02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4
中国妇女	070
THE CHINESE WOMAN	251
中国语言	090
THE CHINESE LANGUAGE	273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100
JOHN SMITH IN CHINA	282
一个大汉学家	110
A GREAT SINOLOGUE	289
中国学(一)	120
CHINESE SCHOLARSHIP, PART I	296
中国学(二)	130
CHINESE SCHOLARSHIP, PART II	304
附录一:群氓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	138
APPENDIX I: 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311
附录二: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	152
APPENDIX II: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OR THE MORAL PROBLEM OF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328
辜鸿铭著译年表	344

序言

而中國的四書
又經——孔子
為拯救中華民
族而設計的文
明藍圖雖然也
這樣教導我
們中國人但
它還補充
了一句要
識禮



序言^①

本书的内容,是试图阐明中国人的精神,并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要估价一种文明,我们最终要问的问题,不是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与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农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种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造就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既如此,那么这一文明中的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语言,也将表明该文明中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法国人谈起文学作品时说“Le style, c'est l'homme(文如其人)”,即是此意。因此,在本书中,我以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为题,组成前三篇,以此说明中国人的精神,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

此外,我还加进了两篇(即《约翰·史密斯在中国》和《一个大汉学家》——译注)。在这两篇文章里,我力图说明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外国人,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②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

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还有那个被认作大汉学家的翟理斯博士,^③我试图表明他实际上并不真懂中国语言,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不够博大——没有哲学家的洞察力及其所能赋予的博大胸怀。起初我本想把约写于四年前的那篇谈到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著作^④的文章也收进此书的,他们那本书讲到了举世闻名的已故皇太后,但很遗憾,我未能找到此文的副本,它原发表在上海的《国族评论》报上。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表明,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样的人没有也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培育出的女性之最高典范——皇太后的。因为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种人不够淳朴——没有纯洁的心灵,他们太聪明了,像所有现代人一样具有一种歪曲事实的智慧。^⑤事实上,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deep, broad and simple)。

在此,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淳朴。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⑥固然,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淳朴,但是法国人,法国人民却拥有一种非凡的、为上述诸民族通常说来所缺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delicacy)。这种灵敏对于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三种之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这种灵敏的程度无以复加,恐怕只有在古代希腊及其文明中可望得到,在其他任何别的地方都概莫能见。

从我上述所谈中,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美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淳朴起来。而美、德、英三国人通过研究中国文明、研究中国的典籍和文学,都将由此获得一种精神特质,恕我冒昧,据我看,一般说来,他们都还远没有达到像中国这般程度的特质,即灵敏。至于法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他们将由此获得一切——深沉、博大、淳朴和较他们目前所具有的更完美的灵敏。所以,我相信,通过研究中国文明、中国的书籍和文学,所有欧美人民都将大获裨益。基于此,在本书中还收入了一篇关于中国学的论文,讨论了如何研究中国的程序纲要。这份程序纲要,是正好三十年前我从欧洲回国后下决心研究祖国文明时为自己制定的。但愿我的这个程序纲要,对那些想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人们会有所帮助。

最后,我还收录了一篇关于现实政治的论文作为书的附录,这篇论文是讨论“战争与战争的出路”问题的。我深知谈论现实政治的危险性。然而,我所以这样做,乃是为了证明中国文明的价值,说明研究中国人、中国书籍和文学,即研究中国文明,不仅仅是汉学家们的事,而且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揭示导致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因为如果不了解并清除这个根源,要找到战争的出路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场战争的根源,就是大不列颠的群氓崇拜(worship of the mob)和德意志的强权崇拜(worship of the might),^⑦但公正地看,前者对后者又负有责任。所以,在本文中,我把论述的矛头重点指向英国的群氓崇拜。事实上,正是欧洲诸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导致了人人憎恶个个谴责的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

在讨论这一点之前,让我先来谈谈德意志民族的道德禀性

(moral fibre)。正是德国人的道德禀性、其对正义所具有的强烈之爱,恰好导致同等的对不义、对分裂和混乱(unzucht and unordnung)的极度之恨。而对分裂和混乱的恨,使德国人迷信强权。所有挚爱正义、憎恨不义的人,都容易成为强权迷信者,苏格兰人卡莱尔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具有德国民族的那种道德禀性,强烈憎恶不义。可是,为什么说英国的群氓崇拜应该对德国的强权崇拜负责呢?这也正是由德意志民族的道德禀性决定的。德国人痛恨分裂与混乱,这使得他们不能容忍大英帝国的群氓、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当他们看到英国的群氓和群氓政客们发动了对非洲的布尔战争的时候,出于对不义本能的强烈憎恨,^⑧他们甘愿为消除这种不义而付出巨大牺牲,整个德国民族因此而准备勒紧裤带建立一支海军,盼望能打倒英国的群氓、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事实上,德意志民族,可以说,当他们发现自己在整个欧洲处于英国怂恿的邪恶势力的四面包围时,他们就越来越相信强权了,越来越迷信只有强权崇拜才是人类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种出于对英国群氓崇拜的憎恨而产生的强权崇拜,最终导致了残暴可怕的德国军国主义。

我再重申一遍,正是欧洲诸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者、群氓崇拜教,应对德国的强权崇拜负责,是它导致了当今欧洲德国军国主义那种畸形变态的残暴和凶恶。所以,如果英国人民和整个欧美人民想要扑灭德国军国主义,那么,他们就必须首先打倒本国的群氓、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⑨对于欧美国家乃至中国和日本的那些爱奢谈和向往自由的人,我愿在此冒昧告知,要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循规蹈矩,即学会适当地约束自己。看看革命前的中国吧——那里没有教士,没有警察,没有市政税和所得税,总之,没有这类使欧美人民苦不欲生的东西。那时的中国人享有较世界其他各民族更多的自由。为什么?因为革命前的中国人循规蹈矩,懂得如何约束自己,如何按照一个良民的标

准去办事。然而革命以后,中国人的自由不多了,这是由于在当今中国有了那些剪了辫子的时髦之徒、那些归国留学生的缘故。这些人从欧美人那里,从上海的欧美群氓那里,学会了怎样放荡不羁,怎样不按一个良民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在北京,他们成为一群被英国外交官和海关税务司怂恿、纵容和推崇的乌合之众。^⑨事实上,我强聒不舍,只是为了说明:假如欧洲人民、英国人民想要消灭普鲁士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就必须先在本国内打击群氓,使之就范。也就是说,必先打倒本国的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

但是,在谈到英国的群氓崇拜和怂恿者对德国的强权崇拜及军国主义应负有责任的同时,我必须公正地指出,后者毕竟对这场战争负有更直接的责任,尽管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灾难比带给任何其他民族的都更加深重。

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我来谈谈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宗教改革运动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民族,因为他们具有自己优良的道德禀性:挚爱正义,痛恨不义、分裂和混乱,所以,当他们一旦紧握军国主义利剑的时候,就成了欧洲文明正统的捍卫者,也就是说,他们为恢复欧洲的正统秩序尽到了责任。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英国的克伦威尔一样,他挥舞德国军国主义之剑,力图恢复整个欧洲,至少成功地恢复了欧洲北部的秩序和统一。然而,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死后,他的后继者却不懂如何使用这把利剑来保卫欧洲的文明,事实上,他是不适合掌握欧洲的道德盟主权的,其结果是整个欧洲,甚至德国的王室,都只是虚饰一件文明的外衣,而实际却沦入了一种憎恨的无底深渊,以至于那些饱受痛苦、本性淳朴的法兰西人,也不得不揭竿反抗。可是,这些本来反抗憎恨的法国人却很快地也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找到了一个伟大而又能干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⑩在他的率领下,群氓们进行

抢劫、谋害和残杀，并蹂躏了整个欧洲，直到各国最终团结在军国主义德国周围，才于滑铁卢一役，打败了这个群氓领袖，并结束他的暴政。本来从此以后，欧洲的道德盟主权就应回到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的脊梁普鲁士人手里的，但由于组成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出于嫉妒，进行了阻止，结果使欧洲的那些群氓们逃脱了德意志民族的道德和军国主义的制裁，他们于 1848 年再度暴乱，疯狂地破坏欧洲文明。后来，依旧是德意志民族及其精华普鲁士人，以他们的道德和军国主义利剑，再度把欧洲、欧洲王权（俾斯麦称作“王朝”）及欧洲文明从群氓手中拯救了出来。

可是这次奥地利人又犯了嫉妒心。他们绝不允许普鲁士人去享受整个欧洲的道德盟主权，为此，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用俾斯麦和毛奇，对他们诉诸武力，终于在 1866 年，重新获得了欧洲的道德盟主权。此后，路易·波拿巴当上了法国的皇帝，他虽然不像其伟大的叔父，^②但却也是一个流氓成性的骗子，按爱默生^③的说法，即是一个成功的小偷。他唆使巴黎的群氓们追随自己，去同德国争夺欧洲的道德盟主权。结果，色当一役，威廉皇帝的军国主义利剑，终于戳破了这个可怜虫的美梦。淳朴的巴黎人民相信群氓，可抢劫和焚毁他们房屋的，不是德国军国主义，不是普鲁士德国人，而恰恰正是他们所信任的群氓。实际上，1872 年以后，德国人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现实政治上，都最终取得了在欧洲的盟主地位。他们的心灵里，蕴藏着本民族的道德禀性，他们的手中握有军国主义的利剑，他们以此镇压群氓，维护欧洲的和平。从 1872 年开始，欧洲人民整整享受了四十三年和平生活，这都得感谢德国人的道德禀性及其军国主义利剑。所以，憎恨和谴责普鲁士德国军国主义的人们应该记住：正是这种军国主义曾一次又一次地为欧洲的和平立了功。

以上，我不厌其烦地叙述德国军国主义的历史概况，只是为了

使德国人明白：我之所以认为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对于这场战争负有更直接的责任，并不是出于偏见。尽管这场战争带给德意志民族的灾难比带给其他任何别的民族的都要深重得多。为什么？——因为能力就意味着责任。^⑭

在我看来，正是德国人身上那种对正义强烈的爱，和对不义、分裂和混乱极度的恨，使得他们迷信并崇拜强权。可是，当他们这种恨一旦恶性发展而失去控制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不义、一种更可怕更恐怖的不义，其罪孽甚至远为分裂和混乱所不及。古老的希伯来——那个曾给欧洲带来过知识与正义之爱的民族，正是由于这种恶性发展的恨——狂热偏激的、冷酷刻毒的、失去控制的恨，从而毁灭了他们的国家。耶稣基督，那位被马修·阿诺德说成无法形容的，拥有最高理性的救世主，也正是为了将其子民从这种憎恨中拯救出来，才谆谆告诫他们：“要记住，必须和善、谦卑，你们的灵魂才会安宁。”然而，犹太人不仅不听他的教诲，反而对其大加迫害，结果犹太国灭亡了。耶稣对曾是欧洲文明保护者的罗马人，也有过同样的警告：“拔剑者必亡于剑！”^⑮可罗马人不仅置若罔闻，反而还纵容了犹太人对耶稣的迫害。结果罗马帝国土崩瓦解，古老的欧洲文明也随之消失了。无怪乎歌德要这样感叹：“要经过多么漫长的历程，人类才能学会温和地对待罪人，宽容地对待违法者，人道地对待野蛮啊！可以断言，最先这样教导，为把此种可能变作现实而推动它的实践并为之献出生命者，一定是具有神性之人。”

在此，我想引用其伟人歌德的几句话，来呼吁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除非他们设法改变那种对不义所抱的偏激、冷酷、刻毒和无节制的仇恨，除非他们铲除由此而发生的对暴力的迷信与崇拜，否则，德国就会像犹太国一样灭亡，甚至欧洲的现代文明也将同其古代文明一样走向毁灭。我认为正是这种恶性发展的憎恨与仇视，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强权崇拜与迷信，而这种迷信与崇拜，又使得